

李旭与李磊对谈

《海上花》把张江当代艺术馆展厅当作品

《海上花:李磊作品展》近日在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举办,参展的作品都是李磊近两年的新作,与他前两年举办的个展有明显的不同。在展览现场,记者有机会让身为策展人的张江当代艺术馆馆长李旭,与身为艺术家的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作了一番对谈。

◎本报记者 邱家和

《海上花》新作引发个展

李旭:我与李磊的合作,始于1999年一起筹办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当时李磊在青年文联,我在文化局挂职,记得是曲丰国的抽象艺术作品得了头奖,还有杨福东、张恩利等艺术家参展。这些人都站住脚了。去年秋天,去李磊的工作室,看到了他的《海上花》新作,提出做现在这个个展。这批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反映了艺术家的文人情怀,洋溢着水墨意韵,表明李磊的诗性抽象落地了。诗性抽象在东方有传统,但抽象艺术的理念却来自西方,因此要找到抽象的点,而“海上花”是一个起点。这以后的作品都是系列。

相比过去同类的这个展览,这个个展的特点是:一、有大作品;二、把整个展厅作为一个作品,有引子,有高潮,有结尾,疏密要有致,有音乐感,有诗意。李磊为此付出很大的努力,春节期间都在埋头创作。那幅大作《满江红》,是为了这个展览特地创作的。这个花了大半年时间的展览,可以说我的期待百分之百实现了。

个展追求展览的节奏

李磊:这次个展的特点,是把整个展厅作为一个作品。张江当代艺术馆的空间很有特点,错落有致,不是一个方盒子,有节奏感。绘画干预的是心理,不在于画幅的大小,展览的空间也是如此。

李旭:日本有专家指出,观众的观画线路如果是沿着展厅匀速移动,那就是失败的展览,如果在作品前不断调整观看的距离,最后形成的观看线路是锯齿形的,那就是成功的展览。

李磊:场馆的空间与李旭的策展理念给了我一个机会,让参展作品带来展览的节奏,与人的心理节奏、生理节奏相适应。

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

李磊:这次参展的作品有海上花、四川森林、练习曲等系列,题材与制作方法有些差异,但都在意境上寻找人与环境的关系:海上花注重表达人与都市的关系,四川森林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练习曲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管怎样,落脚点都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取向是和谐、美。

李旭:李磊的作品容易和观众产生共鸣。抽象艺术不是让你懂的,而是让你喜欢的。

李磊:诗意,是在节奏中激发出的一种感情的倾诉。展览取名“海上花”,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特定的城市,总括上海地域文化的特色,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我的创作研究性非常强,研究色彩的关系、图形语言,尤其是练习曲系列。而《满江红》就是在小幅作品的实验基础上创作的。所谓小画不小,大画不空。

这两年,重点作了色彩的研究,构成的研究、图式的研究。这些都不是纯粹的技术性的研究,还是针对人的情感,是形式与情感的关系的研究。图像,是有意味的形式,是针对某种情感的。情感的提示,包括采用诗句作标题。这次展览呈现这几年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大但很重要。艺术家不是为了画画而画画,要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图式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艺术馆改变了张江

李磊:张江这个馆的硬件软件、文化氛围非常有特点。离不开李旭作为馆长的学术把握。

李旭:做事的羁绊少一点。一方面是艺术馆非盈利的定位;一方面主办方给予充分的信任,给我学术上的

自由度。

李磊:学术把握也很重要。这几年张江的系列展览,凸现了品牌的效应。而“现场张江”则承担了较大的社会责任。张江在科技上是全国领先的,但几年前还是文化沙漠,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展览使张江变了。

李旭:我们的努力就是让张江的环境软化,如何让高科技给人带来的高强度压力释放。

李磊:区域文化建设很重要,有的人不一定能理解,为什么要不断投入做这些展览,表面看什么也没有留下,其实留下感觉了,有了口碑,就是成功。这就是文化软实力,形成城市的生产力,感召力。

李旭:最近张江附近的楼盘,把距离艺术馆多远印入楼书。让张江当代艺术馆成为一种标志,正是我们多年不变的方向,希望逐渐形成浦东浦西的互动。



李磊 海上花 029 布上丙烯



刘大为 马背上的民族

刘大为演绎“史诗与牧歌”

◎本报记者 邱家和

在“五一”前后众多的艺术展览中,在上海美术馆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举办的“史诗与牧歌——刘大为作品展”,给观众带来了西部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卷。在这个囊括了58件中国画、40件水彩色粉以及50件素描速写的大型展览上,观众也可以领略艺术家融合中西、熔工笔与写意技巧于一炉的艺术追求。

刘大为是当代中国人物画杰出的代表画家之一,他的创作主要可分为两类题材,一类是塑造中华民族的伟人、英雄形象的历史画,一类是表现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这两类作品形成了刘大为“史诗”与“牧歌”的创作基调。前者通常指赞颂历史或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业绩的叙事诗,语言风格质朴厚重,结构严谨,气势恢宏;后者则泛指歌唱牧人的生活与爱情的抒情歌曲,艺术情调豪放浪漫,形式活泼,节奏多变。

刘大为的工笔重彩别具一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他的工笔人物画,不是用浓艳华丽的色彩去夸张丰盈宽颤的蒙族人物的肤色与服饰,而是以淡彩减弱蒙族肤色与服饰的厚重感,并以牧马、猎犬和荒漠的清墨色增加这种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笔人物画的淡雅格调。因而,他的工笔人物画不完全是工笔重彩,也不完全是工笔淡彩,而是介于重彩和淡彩之间。在形象的塑造上,偏于写实,造型严谨,但不是完全被动的客观的实写,而是依据客观对象予以必要的简化和适度的夸张,甚至于在写实的形象中寻找内在结构的抽象意味。

从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刘大为长期养成勤奋画速写的习惯,有非常扎实的西画功底和造型能力,因此,在他的水墨写意画上,其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应手、手到擒来。他的水墨人物画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写神之后而体现出笔墨意蕴的品味与格调,并且,这种品格古雅的笔墨之中依然葆留着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鲜活与生动。

因此,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邵大箴先生称刘大为艺术为“融会通达”:“融会,即融合之意,他的中国画作品立足传统,融合中西、熔工笔与写意技巧于一炉,自成一格;通达,即明白、顺畅之意,他的中国画作品,寓深刻之含意于通晓、明白的语言之中,兼有雅境和俗趣,可谓雅俗共赏。”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内蒙古大草原,刘大为没有表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也没有表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寒,而是追寻恬淡却又醇厚的风土人情,漂泊而又宁谧的游牧生活,艰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劳作。刘大为的工笔人物画发掘了蕴藏在那个粗犷、血性和强悍的民族中的一种纯朴的诗意,从而重塑了当代审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



“图像的故事”反思图像的历史

——记《图像的故事——安特卫普古典及新时代大师精品展》

◎本报记者 邱家和

“五一”期间在上海美术馆揭幕的《图像的故事——安特卫普古典及新时代大师精品展》,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重要展览,难得的不仅是因为这些展品由比利时安特卫普最重要博物馆出借,其中包括皇家美术馆、已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帕拉丁·莫瑞图斯博物馆/印刷厂以及当代美术馆(MuHKA);也是因为安特卫普在历史上、在当代都是显赫的图像发展中枢,长久以来一直在开发图像的各种可能;更是因为展览有意识地将图像时代最早的作品与当代最前卫的尝试互相印证,反思图像的历史。

古代经典: 追溯图像时代的起源

从参展的那些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图像历史在16、17世纪经历了一场革命:国际艺术市场诞生于安特卫普,解开了客户对艺术家的束缚,使艺术家为了未知的地点、未知的客户进行创作,导致了新的绘画品类如风景画、静物画等相继出现;同时,印刷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能够大量复制图像,为今天的全球化的

图像文化打下了基础。

比利时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MuHKA)馆长巴特·德巴尔在追溯这段历史时,把艾德里安·布劳威尔的一幅小画《酒吧里的老人》看作整个展览的“舶饰像”,其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人所不见的小事件,不仅选择整个社会等级体系的底层人物,还选择了微不足道的事物如地上的炭块,甚至在画作的左上角留下了一个拇指印。但著名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却收藏了他至少18件作品。因为鲁本斯了解他以善于捕捉戏剧性的眼光结合精湛的绘画技艺,是个百川汇合的人物,代表其艺术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交汇的基础。

他还指出,在西方图像史上有南部意大利与北方法兰德斯两条线索,而法兰德斯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艺术市场,使图像传播成为可能;同时,因应这个时代的需求,鲁本斯本人完成了图像时代的奠基任务,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理念造型及北方法兰德斯的物理造型熔于一炉。

当代艺术: 热衷于“反图像”

巴特·德巴尔认为,安特卫普

